



边疆史地丛书

BIANJIANG  
MINZU LISHI  
YU WENWU  
KAOLU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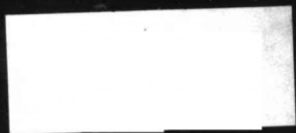
# 边疆民族历史 与文物考论

周伟洲 著

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# 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/周伟洲著. —哈尔滨:  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 2000.8

ISBN 7-5316-3736-7

I. 边... II. 周... III. 边疆 (历史地名)  
- 民族 - 历史文物 - 研究 - 中国 IV. K8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8266 号

边疆史地丛书

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

Bianjiang Minzu Lishi yu Wenwu Kaolun

周伟洲 著

责任编辑:张天栋

封面设计:傅 旭

责任校对:董淑丽

---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·印张 14.875·字数 320 千

2000 年 3 月第 1 版·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 000

---

ISBN 7-5316-3736-7/K·90

定价:22.00 元

## 《边疆史地从书》已出书目

- 《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》
- 《中国边疆史地论集》
- 《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》
- 《俄国外交文书选译——关于蒙古问题》
- 《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》
- 《1898~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》
- 《边疆与民族——历史断面研考》
- 《南海诸岛:地理、历史、主权》
- 《17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》
- 《马克思、恩格斯论国家、领土与边界》
- 《叶尔羌汗国史纲》
- 《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》
- 《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》
- 《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》
- 《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》
- 《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》
- 《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》
- 《安西与北庭——唐代西陲边政研究》
- 《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——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》
- 《清朝藩部要略稿本》
- 《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 1637~1912》
- 《中国古代海疆史纲》
- 《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》
- 《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》
- 《中俄关系史译名辞典》
- 《东北亚国际关系史》
- 《清代新疆军府制职官传略》
- 《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》
- 《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》
- 《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》

## 《边疆史地丛书》序

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,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,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,国境范围时有变迁。在近代,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,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,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。因此,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。

从古代起,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,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。边疆地区在民族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,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。这种差异和特点,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,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

研究中国边疆史地,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,总结历史经验教训,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,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,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,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,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边疆史地研究,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,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,很少有人问津,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,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

支持下,编辑出版了这套《边疆史地丛书》,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,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。

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,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,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,坚持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,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,为巩固祖国的统一,加强各民族的团结,促进边疆建设,繁荣边疆文化,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
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域。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,举凡边疆史地理论、中国历代疆域、边疆民族、治边政策、边疆开发、边疆文化、边疆外交、边疆政教、边疆海岛、边疆人物、边疆考古、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,都在研究之列,其有关专著、资料和译稿,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。

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,因此,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,一定有许多不足,甚至谬误,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  
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

1988年12月

# 前 言

这本拙著主要是作者 1992 年以来陆续撰写的系列专题论文,其主题自然离不开作者的专业——民族史研究和边疆史研究,因内容大多与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关,且多利用考古发掘出土文物,故名之为《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》。

研究历史,特别是中国古代史(包括古代民族史)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是极为珍贵的。它不仅补证历史文献之不足,而且以其直观和形象的特征,为多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。因此,作者一向十分重视考古新发现的有关文物,也许这与作者大学所学考古专业及任职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有关。在拙著中,作者应用了新疆出土的佉卢文书、古藏文简牍,西安新发现的秦封泥,咸阳新发掘的北周贵族墓葬及出土文物,临潼华清宫梨园遗址,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,清代新疆军事舆图,鄂尔多斯新发现的元押式十字铜牌等文物资料,以揭示民族(包括边疆民族)的源流、政治体制、民族关系、民族历史地理及中西交往等各个方面,故有一些新鲜的感觉和看法。

其次,作者还试图应用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,从某些角度来探讨中国历史上一些较为重要的理论问题,如汉民族的形

成,当时在边疆或与边疆地区相关的少数民族内迁及其社会形态的变化,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和边疆政策等,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。这些看法的基本指导理论,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。作者认为,唯物史观并没有过时,只是以前我们应用这一理论时,间有教条主义或贴标签式的方法,故将活生生的复杂的历史变成了一些框框条条,以致引起人们的疑惑。截至目前,作者仍然坚信,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好指南。有关作者这方面的一系列观点,在此书附录《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》一文中,有较为详细的阐述。

作者还恳切地希望得到学界同行和读者的批评及指正。学术的繁荣和发展,理论的建立和完善,都是在不断的争鸣和实践中才得以实现的。

最后,作者还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先生,以及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们,是他们的努力,才使拙著能列入《边疆史地丛书》中,正式出版。

周伟洲

1998年12月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言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民族源流和社会形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一 周人、秦人、汉人与汉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二 苏毗与女国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7  |
| 三 吐谷浑在西域的活动及定居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40  |
|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内徙及其社会形态变化<br>之研究 ..... | 60  |
| 第二章 政治制度与经济开发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81  |
| 一 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81  |
| 二 关于秦汉地方行政体制中的“道” .....               | 98  |
|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制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05 |
| 四 南朝蛮族的分布及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<br>开发 .....      | 128 |
| 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陇西李嵩一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<br>的地位 .....  | 147 |
| 第三章 民族关系研究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70 |
| 一 从民族关系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历史特征和<br>地位 .....   | 170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二          | 试论淝水之战的性质及苻秦失败的原因 .....    | 180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陕西北周墓葬与民族问题 .....          | 194        |
| 四          | 宋夏在陕北的争夺及其影响 .....         | 206        |
| 五          |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 .....         | 228        |
| <b>第四章</b> | <b>边疆形势与边疆政策 .....</b>     | <b>240</b> |
| 一          |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边疆形势与边疆政策 .....    | 240        |
| 二          |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残碑考 .....   | 307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在甘青藏区的活动 .....     | 314        |
| <b>第五章</b> | <b>边疆民族历史地理考释 .....</b>    | <b>332</b> |
| 一          | 陕西北周墓葬主死葬地考 .....          | 332        |
| 二          | 大非与墨离 .....                | 348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一幅珍贵的清代新疆军事舆图 .....        | 362        |
| <b>第六章</b> | <b>丝绸之路与边疆民族 .....</b>     | <b>374</b> |
| 一          | 概说“丝绸之路” .....             | 374        |
| 二          | 丝路兴衰小史 .....               | 378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| 唐“都管七个国”六瓣银盒考 .....        | 397        |
| 四          | 鄂尔多斯发现之元押式十字铜牌考 .....      | 436        |
|            | <b>附录: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 .....</b> | <b>455</b> |

# 第一章 民族源流和社会形态

## 一 周人、秦人、汉人与汉族

### (一)周人的兴起及其融入华夏族

中国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。而华夏族作为一个“民族”(指国家建立后狭义的民族)的共同体,到底形成于何时?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:一是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后,华夏族即开始形成;一是以为经过夏商周三代,至西周时才形成华夏族之雏形,夏、商、周是华夏族三支主要来源。此两种看法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,但如果我们从现在一般使用的“民族”(即古代民族或称为狭义民族)这一概念来分析,则上述两种看法,前者较胜。因为,古代民族的产生是伴随着阶级、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。恩格斯说:“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”<sup>[1]</sup>。国家用各种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措施,使原始社会氏族、部落或部落联盟程度不一地解体,在国家统治的一定地域内,逐渐使用同一语言和文字,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,并由此产生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状态,最后形成为狭义的民族。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,就是指此。

根据上述对民族的理解,我们认为,事实上黄河中下游的氏族、部落和部落联盟,发展到国家阶段时,即我国第一个国家——夏朝诞生后,华夏族也随之形成。所谓“华夏”或“夏”族名称之来源,也就是因夏朝而来。“夏,大也”<sup>[2]</sup>。《尚书正义》注华夏一词说:“冕服华章曰华,大国曰夏。”夏自禹开国,至桀灭亡,共传十四世,十七王,历时四百多年。其中心地区,在今山西南部 and 河南西部,称为“王畿”。在王畿周围,还有臣属于夏的、与之有亲疏不同的方国(诸侯国)或部落、部落联盟。经过夏国的长期统治,这些方国或部落,特别是与夏王室通婚或有亲属关系的方国经济、文化,逐渐接近夏王畿,其人民则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。

比如,在今陕西东部,文献曾记有居甘(今陕西户县)一带的有扈氏<sup>[3]</sup>,其与夏王室同姓,系与夏有亲属关系之方国。即是说,夏国统治的范围,西边至少已达到今陕西东部,这里的方国、诸侯已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。这一结论也为考古学的资料所印证。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在河南偃师等地,发现了一种早于商代的文化遗址,命名为“二里头文化”,并认为这种文化即夏文化。而在陕西东部,考古工作者为探索夏文化遗存也做了大量工作,发掘和发现了一批商代遗址,其中也有一些与“二里头文化”相近、估计为夏文化的遗址,如华县南沙村遗址下层即是<sup>[4]</sup>。

大约到公元前 16 世纪,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在位时,夏东边原称之为“东夷”的方国商,逐渐强大,先后兼并了周围一些小方的方国或部落,其王汤最后灭亡了夏朝,建立商朝。由于商代甲骨文的发现,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。商代统治的地域比夏国更为扩大,其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均承袭于夏朝。文献中有时称商朝统治地区的人为“商人”或“殷人”,也称

其为华夏、夏，即华夏族。即是说，商灭夏后，商人成了华夏族的主体，而华夏族也就日益壮大，分布益广。而在华夏族四周的一些民族也见于甲骨文和文献之中。而兴起于陕西西部的周人，最早也是作为商的一个方国，即区别于以商人为主体的华夏族当中一个族的共同体。

中国古史中记载了周人的起源传说：早在尧舜禹时，黄帝曾孙帝喾（高辛氏）元妃姜原履巨人迹，而生子弃。及弃长大，好耕农，舜封其于郃（今陕西武功西南），号曰后稷，姓姬氏。后稷死，子不窋立，时当夏末，国内乱，子不窋弃官奔“戎狄”之间。到其孙公刘时，复兴农作，其子庆节迁于豳（今陕西彬县北）<sup>[5]</sup>。由此，可知周人原是在陕西泾渭流域的一个部落；传说他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及不窋奔于“戎狄”间等等，则是令人怀疑的，这一切很可能是西周时，周人融入华夏族，共奉黄帝为始祖而附会的。

其实，周人最早也是后世所称之“戎狄”，即非华夏族，区别于商人，只是后来讳言自己原也是戎狄，才有什么奔于戎狄之类的传说。这一点，正如先秦典籍中记载华夏族四周的蛮夷戎狄等民族的来源，是统治者将华夏族的情民、罪犯放逐边裔而形成的一样。例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说：“……犹有散迁、懈慢而著在刑辟，流在裔土，于是乎有蛮夷之国，有斧钺刀墨之民”。《大戴礼记》也有“舜流四凶”，化为夷狄之说。战国时，孟子就曾直接称周文王为“西夷之人”，说舜是东夷之人，文王西夷之人，“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”<sup>[6]</sup>。这也就再确切不过地表述了周人原非华夏族的事实。

那么周人何时与华夏族接触，并融合于华夏族的呢？据史载，公刘八世至古公亶父时，遭到邻近戎狄的攻击，给其珠玉、财物不得免，欲要周人土地和人民。古公亶父于是率民渡漆、沮，

逾梁山,止于岐下(今陕西岐山南)<sup>[7]</sup>,即后世所谓的“周原”。此后,“古公乃贬戎狄之俗,而营城郭室屋,而邑别居之。作五官(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司土、司寇,殷制)有司”<sup>[8]</sup>。可以说,至此周人才开始接受华夏族(商人)的文化而逐渐与之融合。

据文献记载,周人至古公亶父子季历时,曾娶商畿内有挚氏之女,生子昌(周文王)<sup>[9]</sup>,则两族有通婚关系。《竹书纪年》说:“商王武乙三十四年”周王季历来朝,武乙赐地三十里,玉十珽,马八匹。”<sup>[10]</sup>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还记:“周人克余无之戎,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。”然而,季历时周人日益强大,威胁到商朝的统治。因此,商朝又企图削弱周人的力量,多次“伐周”。商武丁时甲骨文中,有“璞(即寇)周”的记录。《竹书纪年》也记:“帝乙处殷,二年周人伐商”<sup>[11]</sup>,说明双方时有争战。到商王文丁,则杀季历<sup>[12]</sup>。季历死后,其子昌立,是为西伯,即周文王。至此之后,文王及其子发(武王)长期与商斗争,并兼并周围殷方国和戎狄。如文王曾灭崇国(崇侯虎),作丰邑(今陕西西安西),并迁都于此<sup>[13]</sup>。武王最终灭亡了商朝。

周人与作为华夏族主体的商人通婚及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关系日益密切,也即是周人华夏化的过程。在商代,周人作为商西边一个诸侯国,其文化内涵上仍然与作为华夏族文化代表的商文化是有差别的。不过,这种差别日益在缩小,而共同性却日渐增多。这一结论也与陕西地区商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结果是一致的。

据我国考古工作的研究,陕西地区商代遗存主要可分为五大文化类型:

(1)商代文化遗存类型:主要以华县南沙村、西安老牛坡、蓝田怀珍坊、耀县北村等遗址为代表。出土的青铜礼器、人殉的墓

葬、车马坑等与商文化相同,分别相当于二里岗时期或殷墟一二期,也有晚至殷墟文化三四期的。由此可知,在商代,今陕西东部的西安、蓝田、铜川、耀县等地,是商人活动的地区,即是说主要是华夏族的居地。

(2)光社文化(也称“李家崖文化”)遗存类型:以陕北清涧、绥德,关中的淳化,山西的石楼等遗址为代表。此文化的特点是出土一批带有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所谓“斯基泰文化”的青铜兵器,如马头刀、铃首剑、蛇首匕等。同时还出土了一批商代形制的青铜礼器等。这类文化在关中以北,估计与商代北方的游牧民族,如鬼方、犬戎等有关。

(3)姜戎文化(或称为“刘家文化”)遗存类型:以扶风刘家村发掘的 20 座姜戎墓及宝鸡市郊石嘴头、晁峪等遗址为代表。其墓葬形制不同于其他商代遗址,墓系长方形竖井,在井一侧坑壁掏一洞室作为墓室;出土陶器有特色,主要是鬲和罐,每件陶器出土时都有一块扁平的石块,盖住陶器的口部<sup>[14]</sup>。这种文化面貌与甘肃辛店文化最为相似,在陕西则集中在宝鸡一带。有的研究者认为,此种文化与商代西北的羌戎族有关,与甘肃寺洼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

(4)蜀文化遗址类型:主要以汉水流域的城固商代遗址为代表。出土的青铜礼器与商代同,也有与蜀文化相似的戈、钺、戣等青铜兵器和铜人面具<sup>[15]</sup>。研究者认为,汉水中上游商文化当与四川蜀文化同一类型,系蜀人的居地。在汉水北的陕西凤县龙口村郭家湾遗址出土的青铜器、陶器也明显带有蜀文化的影响。

(5)先周文化遗存类型:以宝鸡斗鸡台瓦鬲墓初期、扶风北吕、凤翔西村、武功黄家河、岐山贺家、长安张家坡、客省庄、长武

碾子坡、武功郑家坡、岸底等为代表。这种文化类型在关中西部分布最广,其出土陶器常见的器形为高领袋足鬲、园肩、折肩罐等,青铜器则有簠(方格乳钉、夔纹)、鼎(饕餮纹)、铜戈(后背作鸟形)等。前者地方色彩较浓,多带有辛店文化的特点;后者则又与商文化铜器相似。关于这种文化之渊源,目前考古学界中虽然有不同的看法,即有认为源于齐家文化、客省庄二期文化(陕西龙山文化)、辛店文化、寺洼文化、光社文化和商文化等意见;然而,却普遍认为其内涵与周文化相同,且直接与西周文化相衔接,而以上诸种文化对之均有所影响和交汇<sup>[16]</sup>。

从对陕西商代主要的五种文化类型的简约分析中,知分布于关中西部最广的先周文化遗址类型的地区,与文献记载周人早期活动地区是一致的,由这种文化直接发展为西周文化。因此,可以肯定关中的先周文化遗址即是周人克商以前居住的地区,其文化内涵有与商文化相同的因素,也有自己的特点,这恰好反映了当时周人正处于与华夏族融合的过程之中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在周文王姬昌时,周人作为商国家的一个诸侯国,在礼制、文化等方面与华夏族的商人差别已经很微小了。据周原发现的周人甲骨文,其最早的是周文王时,从甲骨文的字体看,与殷墟卜辞有承上启下的关系,相当于卜辞的末期。即是说,周人的文字是吸收商人的文字而来。但是,周人早期甲骨文在字体(细小)、钻凿和卜法、体例、内容等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<sup>[17]</sup>。这正说明,在周文王时,周人文化已接近于商人,基本上摆脱了戎狄的身份,接近或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了。

周人不仅自身逐渐华夏化,而且其征服或结盟的邻近各族,也渐与周人融合,使周人不断壮大发展。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史载之羌人。据文献记载,在周人之西,商代还有西戎中最重要



的一支羌族。商代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征伐羌人的记载,羌字作义、𠂔等,卜辞中有关征伐、俘获羌人及以羌人为祭品的,武丁六十多件,廪辛四件,康丁六件,武乙一件,乙辛一件<sup>[18]</sup>。周人的兴起与羌人关系甚大,有的学者认为,传说周始祖后稷母姜原、太王(古公)之妃太姜,武王元妃邑姜,均为羌人,羌、姜古音一致,互通互用;邑姜即姜太公女,则太公一族原很可能为羌族。即是说,早在殷商时,与周人联姻、关系密切的姜氏部落,原系西戎中的羌族<sup>[19]</sup>。前述陕西西部与先周文化内涵极为相似之姜戎文化,则很可能即是关中羌人的文化遗存。

周武王克商以后,周人的含义扩大了,即凡周朝统治的人均称为周人,也就是周朝之人。其内自然是以夏、商时的华夏族及已融入华夏,并自认为是华夏代表的原周人为主干,包括西周统治下的一些诸侯方国。由于周人成为华夏族主干和越来越多的诸侯、方国的华夏化,使华夏族及其居地大为扩展,几乎包括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。而周承殷礼,并有所发展,使华夏族的礼仪、文化等各方面日趋成熟,形成为一整套制度,对后世影响甚大。正因为如此,有的学者认为华夏族正式形成于西周时,自然也有其正确的一面。

然而,以西周王畿为中心,包括四周的诸侯方国,形成为华夏族聚居之地,在华夏族四周及居地内还存在着许多非华夏族。就拿陕西地区来说,关中及其四周还有一些见于金文及文献的民族,如周人西北的犬戎(一作“混夷”、“猷夷”等)、北边的獫狁(商代之鬼方)、西边的各种戎族(包括羌戎)、陕南汉水流域的蜀人、巴人等;就是在关中,也有大荔、陆浑等戎族。在西周时,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;只是到了西周末期周王室衰弱,周围的戎狄纷纷进入中原内地,而内地诸侯方国势力增